

不动声色

纤夫远去号子悠

从劳动号令到国家非遗的川江号子

本报记者韩振、刘博伟

“如今,我带着您教我的那首歌,从朝天门唱到天安门,从长江头唱到长江尾,从嘉陵江岸唱到香江两岸……”

我相信,这川江上的号子声,一定会从高峡的深处飞出去,飞向更广阔的世界。”

曹光裕,川江号子唯一国家级传承人。今年教师节,给恩师陈邦贵写下了上面的话。

寥寥几句,写出了川江号子的前世今生,更写出了川江号子日益光明的未来。

江上传承

川江号子,是船工和纤夫为鼓舞劳动士气、统一劳动节奏而产生的一种“一领众和”的民间歌唱形式,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作为木船时代川江流域的一种工作号令,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时光倒流。“拉起纤藤,哟!哟!……”1987年的一个下午,23岁的曹光裕和往常一样,在朝天门码头的一艘趸船上,吼着高亢的号子,卖着大把子力气。那时,趸船多未装上发动机,遇到水涨水落,只有靠着船工们合力拉动。号子,便会响彻江岸。

尽管拉船时戴着手套,穿着很厚的衣服,曹光裕和工友们的肩膀和手掌,还是难免被钢绳磨破。

同一时刻,川江段最出名的号子头陈邦贵老先生,在法国唱响了这样的号子声,获得了“可以同久负盛名的《伏尔加河船夫曲》相媲美”的赞誉。截誉归来后,川江号子的艺术价值被认可,如何传承下去也变得更加必要和急迫。曹光裕跟陈邦贵属于同一个轮渡公司,但此前从未谋面。一次歌唱比赛中,曹光裕洪亮的声音,深深打动了陈邦贵,两人从此结缘:曹光裕成为陈邦贵老先生的亲传弟子。

那时候,船工们最怕号子响。号子头一吼嗓子,就意味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开始了。曹光裕当时还想不通:号子怎么就成了艺术呢?

虽然确定了师徒名分,但每天被繁重体力活压得直不起腰的曹光裕,对学习号子却非常排斥,从不主动去找师父学习,甚至听到师父来码头找他,还想方设法悄悄溜出去。心想,这老头儿扑克半次,应该不会再来找他了吧。

直到有一天,别人告诉曹光裕:码头上站着个老头,看着像你师父陈邦贵,怕是要跳江。

曹光裕赶紧跑过去,走近一看,果然是师父。只见师父拄着个拐杖,默默地注视着江面,一言不发。

不发。

曹光裕问他要干嘛,是不是想不开。他说没有,就是有点难受:我都70多岁了,能活到那一天都不知道,就怕眼睛一闭,川江号子民间艺术瑰宝就失传了。

曹光裕看着师父,突然觉得很心疼,刻骨铭心的疼。

回忆起当年在江边正式拜师的情景,曹光裕眼圈泛红,他总觉得自己应该再早点儿理解师父的苦心。

尽管被老先生的精神所感动,年轻的曹光裕还是对川江号子深有深情。直到随着机动铁船的普及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喊号船工渐渐没了用武之地,川江号子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和其他很多下岗船工一样,转行上岸的曹光裕,很长一段时间都面临着“四处求职、八方碰壁”的窘境。

沉重的生活压力下,他发现喊几声号子,能抒发心中的抑郁。这时,他才深深地认识到:川江号子里,蕴含的是向上的力量,是一股永不放弃、抗争命运的精气神儿!

真心爱上川江号子的曹光裕,终于明白师父的良苦用心,这才踏踏实实向师父学习。他暗下决心,不仅要让川江号子的精神延续下去,还要让它创造出更大价值!

舞台新生

2006年,川江号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保护整理工作得到了更多政策支持和社会关注,也让曹光裕这些传承人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

国家修好了文化传承的“高速公路”,曹光裕所做的,就是打通对接民众的“最后一公里”。

非遗文化传承,生产性保护是一条出路。2014年,曹光裕把一些对川江号子有了解、有情怀的老船工和家属组织起来,以“重庆老船工艺术团”的名义对外承接演出。

那时候,船工们最怕号子响。号子头一吼嗓子,就意味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开始了。曹光裕当时还想不通:号子怎么就成了艺术呢?

虽然确定了师徒名分,但每天被繁重体力活压得直不起腰的曹光裕,对学习号子却非常排斥,从不主动去找师父学习,甚至听到师父来码头找他,还想方设法悄悄溜出去。心想,这老头儿扑克半次,应该不会再来找他了吧。

但曹光裕创新的脚步,并未停滞不前。他历时半年,走访川江流域及其支流,广泛收集素材,把这部情景剧磨成了“2.0版”。

“回想当年船工,生死鬼门关,临危不惧……”一个普通的周三上午,重庆文化馆的排练厅里,头发花白的老船工杨志均正在排练着新版《大江传歌》主题曲,为即将到来的密集演出做准备。

今年67岁的杨志均,是最早加入艺术团的成员之一。一开始,家人并不支持他参与排练和演出。儿子数叨他:你这么大年纪了,就在家帮忙带孙子多好,非要搞这些“空名堂”。

后来,儿子眼看着他身体越来越好,不仅好几次在中央电视台演出,还跑到上海、南昌等地演出,电视上也经常播出父亲的节目。儿子开始为他

演出,只有创造价值才能演下去;演员,只有演下去才有稳定的收入。好的演出,需要好的演员;好的演员,才能给出好的演出。只有形成了良性循环,文化传承才能绵延不息。



▲ 12月10日,2020世界大河歌会上表演的情景舞蹈《川江号子》。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老船工艺术团的演员们,每个月可以拿到上万元的演出费。

演出的火爆,不仅得益于川江号子本身的历史文化魅力,也离不开演出形式上的创新。

原汁原味的川江号子,唱词单一,重复性高,表演时间短,如果完全照搬上舞台,观赏性将大打折扣。

为让节目更好看,曹光裕拉上音乐科班生出身的儿子曹羽,按照七分原味三分创新的比例,调制出了情景剧《大江传歌》。

2018年8月,《大江传歌》搬上舞台。两年间,在两江游船上完成了300多场演出,受到游客的好评和赞誉。

但曹光裕创新的脚步,并未停滞不前。他历时半年,走访川江流域及其支流,广泛收集素材,把这部情景剧打磨成了“2.0版”。

“回想当年船工,生死鬼门关,临危不惧……”一个普通的周三上午,重庆文化馆的排练厅里,头发花白的老船工杨志均正在排练着新版《大江传歌》主题曲,为即将到来的密集演出做准备。

今年67岁的杨志均,是最早加入艺术团的成员之一。一开始,家人并不支持他参与排练和演出。儿子数叨他:你这么大年纪了,就在家帮忙带孙子多好,非要搞这些“空名堂”。

后来,儿子眼看着他身体越来越好,不仅好几次在中央电视台演出,还跑到上海、南昌等地演出,电视上也经常播出父亲的节目。儿子开始为他

感到骄傲:我老汉儿还是可以!

和杨志均一样,很多老船工下了船,反而更怀念当初一起拉纤喊号子的时光,能有这么一个舞台聚在一起喊喊老调子,唱唱自己的故事,觉得很充实、很幸福。

如今,这支平均年龄65岁的表演团队,已经由最初的不足10人扩增到50人。

从普通船工到职业演员,改变的是歌者本身,不变的是对川江的依恋;

从单一的劳动调子到大型互动体验剧,变的是川江号子的表演形式,不变的是那一声声呐喊里,不向贫穷苦难低头的冲劲儿;

从江面木船到一个又一个舞台,变的是演唱场所,不变的是那一根根纤绳里,劳动者与命运搏击的动人故事。

川江号子,从水上唱到了岸上,从岸上唱到了舞台上,从舞台上唱到了观众的心里,从观众的心里进入时空的隧道。

它在那里传诵,经久不衰。

归于生活

回归生活,这是曹光裕最新的追求。

川江号子既然是劳动人民在生产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就绝不该仅仅在舞台上、在艺术层面得到认可,而是应该回归大众、回归生活。

虽然号子的生产形式和行业消失了,但其

提倡团队协作和歌颂劳动力量的精神内核是永恒的。给川江号子找到新的时代价值,比挖掘它的艺术价值更有意义。

早在2012年开始,曹光裕每周都会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小学授课。他从小学二年级到五年级,选拔出80多个学员排练川江号子的节目。几年间,他带领孩子们四次上北京演出,其中一次还拿了全国蒲公英大赛金奖。

曹光裕自己也常常被孩子们的学习热情所打动。在这所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免收借读费的定点学校里,很多学生家长都是体力劳动者,孩子们对川江号子中蕴含的劳动力量,比很多成年人理解得还要深刻。

他们真心喜欢川江号子。

除了人民路小学,重庆市大田湾小学作为全国足球特色学校,也敏锐察觉到川江号子里所蕴含的齐心协力、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今年9月开始,曹光裕每周定期前往这所小学授课,让合作意识和凝聚力量在孩子们心中扎根来。

近年来,随着素质教育的发展,不仅仅是小学,各大高校也越来越重视学生的意志品质教育,这为川江号子精神内涵在生产活动中发挥作用创造了契机。

目前,重庆多所职业教育类学校都主动与曹光裕所创建的川江号子传习社接洽,希望借助川江号子的文化内核,更好地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职业技术学院不同于一般本科院校,其目的是培养产业技能人才,所以这些校方看到了川江号子所具备的劳动精神和合作意识,很愿意把这门艺术引进校园。

一些行业会议也邀请老船工艺术团演出,他们希望借由川江号子的表演,让行业内部时刻牢记抱团取暖、互相扶持。

川江之上,飘摇的木船消失了,拉纤的身影不见了,空中飘荡的号子声,也被江风越吹越远。

但这些消失的景象,飘散的声音,不屈的精神,正在生活里重生,不过换了一副容颜,换了一个场景。

“拉起纤藤,哟!哟!嘿!闯风雨哟,嗨嗨!哪怕险阻,哟!哟!嘿!嘿!浪也陡哦,嗨嗨!一声号子,哟!哟!嘿……”

生活,无论是酸楚,抑或是甜美,都离不开这样的声音,更离不开这样的精神。

川江号子,正在赋予生活以意义;生活,也将赋予川江号子以价值。

说不尽的曹禺,演不完的“曹剧”

纪念曹禺诞辰110周年

宋宝珍

1910年,一个名叫万家宝的孩子诞生于天津。1934年,他以曹禺的笔名发表了剧作《雷雨》(此前曾以此名发表小说),此后又创作或改编了《日出》(1936年)、《原野》(1937年)、《北京人》(1941年)、《家》(1942年)等优秀剧作,这些剧作脍炙人口,成为经典,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不仅被译成英、法、俄、德、意、日、韩、蒙古、西班牙、阿拉伯等多种语言,而且在各个剧院和中外舞台常演常新。其戏剧还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舞剧、歌剧、京剧、地方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就先后15次创演、复排曹禺的8部话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名噪一时的作品逐渐归于沉寂,而曹禺的戏剧却越来越凸显其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

“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

曹禺是谁?以他23岁创作杰作《雷雨》的经历,他简直是艺术史上的奇迹;而以他35岁之前才华横溢,此后便一直处于“正在写”而写不出的状态,他又是否特别值得研究的案例。曹禺曾经对给他写传记的田本相说,你要写我,先要写出我的苦闷来。

曹禺的苦闷首先来自家庭的氛围:他的父亲万德尊曾经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这个学校出过很多中国军事名人,如蔡锷、蒋百里、阎锡山等,万德尊归国后曾任民国总统黎元洪的秘书,无奈政治局势波谲云诡,黎元洪倒台,不足40岁的万德尊赋闲归家,在天津海河边上购置了一座西式洋楼,过起了寓公生活。

万德尊的第一位夫人生年纪轻轻去世,曹禺的母亲嫁入万家,却在生下曹禺三天后因产褥热逝世。家庭事业皆不如意,万德尊便在家中聚集一帮落魄文人,人前他排遣抑郁,纵情诗酒;人后他歇斯底里,乱发脾气。曹禺的父亲、兄长都吸食鸦片,常常是在曹禺放学回家时,他们还沉睡未起,家中如坟墓般萧索、冷寂。

曹禺的继母是他生母的孪生妹妹,对待曹禺视若己出,曹禺一直认为继母就是生母。可是刁钻的女仆刘妈在与继母有了嫌隙之后,就故意告诉曹禺:她不是你的亲妈。童年的曹禺在知道生母已逝的那一刻,便内心悲戚,顿觉无所归依,从此那种孤独飘零的情愫萦绕他一生。在他18岁的旧历年,家道败落后父亲突然病逝,除夕夜家人都在迎新纳福,曹禺却不得不向亲友报丧求助,当那些院落的大门被敲开时,迎接他的是惊诧、厌恶,那种寒冷令他发怵。

曹禺说“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心里永感着乱云似的仓促、切迫”,他的家庭和周遭发生的事情,都刻印在他的心里,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一种无名恐惧的象征”“《雷雨》的降生,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一种情感的发酵”。曹禺的写作来源于自己抒发的生命表达。

歌德说过,艺术是人类精神灌注其中的产物,对于创作者而言,不仅耗其神思,而且劳其筋骨。抗战时期,曹禺在四川江安的国立剧专做教授,战火中的辗转奔波、教学中的劳心费神,让他的创作受到影响,他那如江水般奔涌的创作才思受到阻碍。

抗战戏剧风涌之时,各处都需要剧本,很多人向他催稿子,可是他一时半会写不出来,就对人家说,正在想,正在想。以致后来他有一个剧本的名字,真的就叫《正在想》。

他的创作起点很高,一直都在想着出大作品,出好作品。他在写作剧本《北京人》时,想着要突破自己,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艺术目标。为了找个安静的地方,全力以赴,他居然躲到长江边上一条抛锚的江轮上去写作。三伏天的甲板上依然闷热,曹禺就打着赤膊,日复一日,挥汗如雨的地上写作。江岸边上的纤夫们看到他如此辛苦,问他在干什么?说他在写剧本,纤夫们大概,总以为自己是苦人,原来写个剧本也是这么苦。

这一时期曹禺结识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大家闺秀邓泽生,邓泽生后来改名方端,曹禺每写完一部分剧稿,就交给方端誊抄。方端以一手秀雅端庄的蝇头小楷,把稿子抄写出来,其中一部分手稿在北京人艺的戏剧博物馆里还能看到。这既是珍贵的戏剧文物,也是艰苦岁月里他们用心血淬炼的艺术结晶。

曹禺渴望灵魂的自由,他笔下的人物是他灵魂的表征。繁漪“最雷雨的性格”里有对爱情的渴求、对自由的向往,她想冲破压抑沉闷的周公馆,摆脱“最有秩序的家庭”当中最难忍受的被动服从,找到一片能够畅快呼吸的自在天空。

《日出》中的陈白露家道中落之后,成了大饭店的交际花,靠着出卖年轻漂亮的身材,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直到曾经的同学、她的痴恋者方达生到来,叫起她从前的名字,直到她感知了被侮辱与损害的小东西的悲惨结局,她才终于明白,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资本世界里,她想在大饭店里找到苟且偷安的一隅是多么的可笑幼稚。她在肉体已经深陷泥淖之时,依然保持着灵魂自由的渴望,她用安眠药葬送了自己的人生,却把灵魂的归宿安放到阳光洒下的青草地上。

《雷雨》中的仇虎被复仇的意念所控制,然而



▲ 曹禺

新华社资料片

复仇之后的归宿却是他向往的“金子铺地的地方”,尽管他也不清楚那个地方在哪里,怎样才能到达。但是,在他的梦想之中,那里至少不会有焦阎王那样的恶霸,不会有大人与人尔虞我诈、相互欺压造成的仇恨的毒芽。那里应该有一个像原始的“北京人”那样的生命,他不啻制造了“死活人”“活死人”“活人死”的社会契约,他有足够的力量打碎一切桎梏,想爱就爱,想恨就恨,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创造力、符合人类存在的本质意义的人。哪怕历经苦难,到了生命尽头,也像《家》里的瑞珏一样,望着漫天的飞雪,依然相信“冬天也有尽了的时候”。

“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

曹禺说:“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是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我把人说清楚了’。”田本相在《曹禺传》中写道:“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曾经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

《雷雨》中塑造的周朴园,在他认为最有秩序的家庭里却制造了

一个社会的鲜明群像,他们不仅有生命的质感、人性的内涵,更有时代的烙印、哲思的韵味。